



社会发展理论丛书



KNOWLEDGE THOUGHT POWER

知识 · 思想 · 权力

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

田毅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发展理论丛书



知识 · 思想 · 权力

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田毅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161-0023-3

I. ①知… II. ①田… III. ①政治思想史—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 ①D092②D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9224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特约编辑 雷家琼
责任校对 韩天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5(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2		
印 张	18.5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发展理论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孙正聿

副主任 孙利天 贺 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成 王南湜 王振林 孙正聿

孙利天 刘福森 吴晓明 邴 正

杨魁森 姚大志 贺 来

总序 发展的标准与选择

孙正聿

20 世纪 80 年代，吉林大学在国内率先创立了社会发展研究所，90 年代中期又组建了哲学社会学院，并在 2004 年成立了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对社会发展理论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发展，在其真实的意义上，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以社会的发展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既是当代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争论最激烈的理论问题。这是因为，趋利避害的人类生存逻辑，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受到了空前的严峻挑战。

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发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它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舍弃。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破坏

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不是幸福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对于人类来说，这个生存逻辑是对人类自身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的严峻挑战。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当代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发展问题。

把“发展”作为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予以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它所面对的理论问题，首要的是对“发展”的理解和评价问题。发展，这不只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存在状态或存在过程的评价，因此，“发展”是以评价为逻辑前提的对存在的描述。这表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进程如何评价的问题，以及依据某种评价的标准作出行为选择的问题，即在实践中作出各种顺序性安排问题。作为人类生存逻辑的趋利避害，“利”与“害”的标准如何确认，怎样的行为选择才是当代人类的真正的趋于“利”而避于“害”，怎样的顺序性安排才能使“利”大于“害”，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标准”与“选择”构成社会发展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核心范畴。

“发展”的标准具有极为深刻、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它既内涵着文化的多样性，又内涵着每个时代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它既内涵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又内涵着现代化的多元选择；它既内涵着“历史的大尺度”，又内涵着“历史的小尺度”。所谓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所谓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生活本身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小尺度”而仅仅承诺历史的“大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无法实现“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惨

痛的是会使这个“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变形，把“大尺度”变成某种压抑个人发展的“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大尺度”而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小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失去“大尺度”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严峻的是使这个“小尺度”所规范的历史活动危及人自身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在这种“小尺度”中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关于“发展”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作为“历史的大尺度”与“历史的小尺度”的“微妙的平衡”，构成了我们的行为选择的出发点。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这个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的三大问题：一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致力于解决公共利益最大化、满足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的民生问题；二是致力于解决资源环境体系的压力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致力于解决公共治理结构中的政府自身建设问题，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下的行为选择，也就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对现代性的行为选择。

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在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我感到，解放思想，首先需要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气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宏伟的气魄和开阔的视野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解放思想，还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地凸显出来，它要求理论工作者以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去研究这些深层次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有了这种凛然正气，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解放思想，还需要有创新的理论勇气。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解放思想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要求我们：一是要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

中解放出来，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而不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作出某种简单化的判断和评说；二是要从唯上唯书、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我们面对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出发，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要从僵死枯燥、言之无物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作出新的论证和新的阐释。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的关切点总是自己时代的最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并构成我们时代的诸多的重大课题，引发了我们的共同的关切与期待。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

序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勃兴以来,中外比较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一时间中外比较类著述不断问世。其中既有宏观比较,又有微观比较;既有整体比较,又有局部比较;既有同时代比较,又有跨时代比较;既有单一学科比较,又有跨时代比较,等等,可谓层次繁多,门类齐全。而且,不仅有整体中西比较,更有国别类的美、中、日等比较研究,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这些论著,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对于国人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及其相互沟通,不无裨益。但从中西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原则来看,在观察中西文化的差别性和同一性的过程中,比较研究如何抛开支流末节,抛开偶然性的枝节之论,使比较研究的视线真正聚焦在带根本性、普遍性的关键问题上,从而触及中西文化“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写出既有功力,又能发人深省的论著,则并不多见,或者几乎是凤毛麟角。有些所谓的比较研究或流于形式,或失于肤浅,甚或得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结论,作出幼稚荒唐的判断,令人不能卒读。田毅鹏先生《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一书的问世,则令人耳目一新,称得上是中外比较研究领域的一枝奇葩。

田毅鹏的这部著作以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为主题。以往的这类研究,大多主要集中于早期现代化,即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两个时期,并以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战后日韩经济发展奇迹等事件为重点,可称之为“短时段”的“事件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澄清了一些事件或运动的具体进程,但其局限性也至为明显:只注意中日社会现代化的剧烈变迁时段,却忽略了现代化启动发轫和发展推进的全过程,因而未能进行纵向的“探源式”的长时段的学术

探讨,尤其未能抓住带根本性的关键问题,进行全景式的深入跟踪研究,从而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高屋建瓴式的突破。毅鹏的中日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则一改上述做法,他认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东亚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连续性的发展过程。因为东亚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之前,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有着厚重文明积淀的地区,这必然使其走向现代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由“传统”到“现代”的直接过渡,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揉搓过程。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就应该改变以往“短时段”研究取向,将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置于一个“长时段”中,探索其连续性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一总体思路下,作者从思想比较研究角度,以西学东渐背景下中日两国“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这一根本问题作为切入点,从中日两国摆脱传统世界观的束缚,到确定现代世界秩序观,进而启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现中日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差异,及由此导致中日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的深层原因。

正是经过上述缜密研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中叶前后中日两国发生的知识变动和思想变动,对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发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1774年,以《解体新书》的翻译出版为标志,日本知识精英已经摆脱了“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局限,确立了“科学实证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近代政治意识,为日后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准备了条件。而此时清王朝的朝野人士仍然深陷于华尊夷卑的传统体制内难以自拔,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如果将19世纪50年代前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的出版作为“近代世界秩序观”确立的标志,那么,我们会发现两国竟相差近两百年的时间,其间存在的时间差令人惊叹。发现中日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不同步性”,其价值在于更好地从比较分析中认识中日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描绘出两国现代化的特殊运行轨迹。它告诉人们,中日两国早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就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不仅表现在器物的学习摄取方面,而且在政治思想领域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这实际上是两国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综合回应能力的集中体现。很显然,正是这种差别,决定了中国在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阶段便已落在了日本的后面。本书的这些见解,我们在今天读来,仍不免扼腕叹息,又不无振聋发聩之感。

本书作为中日思想比较研究一部力作,其更大价值,则在方法论上的突

破。以往思想史研究,不论思想家与思潮研究,大多限于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式研究,至多和政治史、社会史结合,从历史背景角度去解读某一思想或思潮产生、发展乃至衰落的历史原因。这类做法,时髦点说,称之为“土壤分析”,或“在场”研究。本书的新颖之处,则在于研究中日两国现代秩序观的产生,除了揭示其经济、政治因素外,还把思想史研究与知识史研究结合起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探讨现代世界秩序观产生的“知识前提”,重点比较研究中日两国在前现代化阶段“知识因素”的差异,了解中日两国社会精英在此时期内的读书生活、著述生活及知识界视野扩大的情况,展示两国“西学东渐”进程中的“知识转移”的实态,进而揭示两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解、科学实证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对现代政治意识影响的具体过程。例如作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中日两国在西学东渐上作出的不同反思:“翻译——知识移动的媒介”,“地理观念——关于空间知识的变动”;“文化观念——华夷观的‘畸变’与‘消解’”、“西学知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而对中日两国的知识变动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由此发现:与日本对西方语言的大力学习摄取不同,明清时期的官方和民间都对西洋语言采取了漠然拒斥的态度,致使中国丧失了学习摄取外来文化最基本的工具,失去了主动学习移植外来文化的契机。而在空间知识的拓展和“自我中心论”的突破等方面也落后于日本。由于前近代时期的中国仍然沉浸于“传统世界秩序观”之中,其社会精英固守传统知识,导致士大夫群体的传统知识结构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其现代政治意识自然难以产生。作者以此来破解中日两国现代思想产生的内在逻辑,其扎实严谨的结论,不能不令人折服。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突破,是以往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只重视思想家或握有政治权力的人物具有实践意义的政治主张的研究,很少将权力分析纳入政治思想研究体系。而本书在剖析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及其社会影响时,把“思想”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纳入到研究范畴之内,一方面注意政治权力结构对政治意识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注意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反作用。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任何政治思想,如果不对政治权力发生作用,产生影响,而仅限于藏之名山、传诸后代的话,其社会影响,尤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魏源《海国图志》一书在近代中国和日本遭遇的不同命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书作者有鉴于此,在研究中十分强调“思想”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交流,并从二者之间的互动中把握

多个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据此,作者认为: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思想界虽然发生了剧烈变化,但在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权压制下,其现代思想并未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的体系。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夜却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在日本,开明力量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虽然非常激烈,甚至也发生了像“蛮社之狱”这样的剧烈冲突。但幕藩体制下的权力分裂,却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应有的活动空间,使得思想界和政治人物之间的互动极为频繁。因此,思想界的徐徐清风得以吹进政坛,使思想界的最新主张与革新势力代表人物结合在一起,导演了一出悲壮的维新变革的剧目。

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使作者始终坚持从知识—思想—权力三者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来求得对政治思想发展上的新理解。为此作者首先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尤其注重思想产生的“场”的研究,既特别重视现代政治意识产生的“知识前提”的考察,也不忽略组织和团体对思想产生和发展影响的研究。为此,作者十分关注诸如知识更新问题、知识传播问题、知识传播与思想界变化问题;其次由于作者又强调思想与权力的互动,因而又格外关注知识与权力关系问题,知识向政治统治体系内部渗透问题,统治阶级内部开明势力的出现与形成问题。凡此种种,都使作者能从崭新的视角,清理出传统思想发展的基本理路,得出了与以往学术界成说全然不同的新结论。例如,关于现代意识产生的标志,日本学术界此前以西方文明为坐标,从比较角度看,面对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中日两国现代政治意识发轫期的最初形态,不是由“洋学”衍生出来的“民主启蒙”思想,也不仅仅是通过传统思想的分化而产生,而是以回应西方资本主义挑战过程中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政治整合思想”、“开放意识”、“早期民族意识”等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为主题内容。同时,中日两国现代政治意识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存在着相当明显的“时间滞差”。这些见解至少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是颇具贡献的。

我还想强调的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绝不像时下某些著作那样短时间“攒成”的,而是作者从本科、硕士、博士,直至当下的近三十年持续研究所得出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者读大学本科时,就已关注中日现代化比较问题,其毕业论文《论戊戌维新派“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即对戊戌维新派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如萨摩、土佐诸强藩倒幕维新的变法行动进行了比较研究。攻读硕士阶段,作者选取了《鸦片战

争前后中日两国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历史影响》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对此课题作了持续性的研究。博士论文《知识·思想·权力——中日近代政治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则锲而不舍地关注同一问题。博士论文完成后,作者至今又用近十年时间连续就此作深入研究,迄未间断。仅据我的粗略统计,从本科到现在,作者有关中日现代化比较的论文,就已近 30 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就有 2 篇,可以说早已蜚声海内外。

我在大学毕业十年之后,于 1979 年考取吉林大学李时岳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而田毅鹏则在同年进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85 年他攻读赵矢元先生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则因留校任教,经常在赵先生家讨教而彼此相识。在我的印象中,田毅鹏在赵矢元先生的为数不多的弟子中,不算是最聪慧的,也不是出名最早的,但却是最刻苦、最勤奋,也是最执著的一个青年学子。我们之间虽然年龄整整相差 20 年,但早已结成忘年交,学业上互相切磋,时有往来。1998 年他从吉林师范学院历史系调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彼此互相切磋就更为频繁。1999 年他投入我的门下,成为中外政治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在博士生培养问题上,我素来主张博士生应明确方向,做持续性的掘井式研究。故我嘱其继续从事中日现代比较研究,他则以中日现代政治意识的形成作为比较研究的切入点,论文写得很有功夫,获得同行专家的极大好评。由此所形成并公开发表的十多篇论文,先后被很多报刊转载或引用。作为导师,我深感欣慰!

现在毅鹏早已晋升为教授,成了博士生导师,并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同时兼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国家 MSW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吉林省社会学会副会长。此外,还先后被评为“宝钢优秀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等。作为不到 50 岁的中年人,可以说在学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常说“天道酬勤”,他的成功,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我想补充的是,数十年来,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也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的学术追求从未停止,攀登高峰的渴望从未减弱。这使我想起郑板桥《竹石》中歌颂的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套用这个诗句,来形容毅鹏在中日现代化研究中近三十年的执著追求,并不过分吧!

不过随着荣誉的增多和责任的加重,外界的诱惑难免也随之而来。我

衷心期望毅鹏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矢志不渝地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稍有懈怠,著述中字里行间就会透露出来,不仅作者本人心知肚明,学术界同行也会看得清清楚楚。我愿以杜甫《偶题》中的这段诗句与毅鹏共勉,期望他在今后能写出更多、更有功力和真知灼见的新作奉献给大家!

是为序。

宝成关

2011年9月17日于长春柳条路寓所

目 录

导言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对以往研究的学术考察	(6)
三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19)
四 “比较思想”研究方法的反思	(25)
五 比较研究的时段选择	(36)
六 本书拟突破的重点和难题	(42)

第一部分 西学东渐与中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变动

第一章 西力东侵与中日两国的初期回应	(47)
一 东亚文明结构系统内的中国和日本	(47)
二 锁国闭关前中日两国与西方的早期接触	(56)
三 走向“禁教锁国”	(62)
四 锁国闭关时代中日“西学政策”的演化	(66)
第二章 传统政治权力与知识思想界的互动	(75)
一 社会控制系统中的“知识”、“思想”、“权力”	(75)
二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之比较	(79)
三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权力对知识和思想的控制	(90)
第三章 16—19 世纪中日两国的“知识变动”	(104)
一 翻译：知识移动的媒介	(105)

二	地理观念:关于空间知识的变动	(114)
三	文化观念:华夷观的“畸变”与“消解”	(121)
四	西学知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129)

第二部分 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

第四章	危机意识的萌生及其演化	(139)
一	中日两国传统的忧患观	(140)
二	西力东侵与中日危机意识的“阶段性”转化	(142)
三	危机意识的“强化机制”与“消解机制”	(147)
第五章	体制变革与现代国家建构	(151)
一	17世纪中日思想界对“统治体制”的反思	(153)
二	19世纪中叶前中日政体变易论的“非同步发展”	(157)
三	“国家体制整合”论与19世纪中叶后中日政治改革 运动	(166)
第六章	华夷观念的崩解与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	(176)
一	19世纪中叶前中日华夷观念演变的不同路向	(177)
二	19世纪中叶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	(182)
第七章	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体认	(193)
一	对人类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初步认识	(194)
二	现代外交意识的确立	(196)
三	海外侵略思想与封关制夷论	(202)
四	中日两国出使西洋活动的展开	(207)

第三部分 “现代思想”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关系

第八章	精英思想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渗透”	(219)
一	现代化观念向政治权力内部的“渗透”	(219)

二	“现代思想”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冲突	(232)
三	开国进程中的“公论”、“舆论”及其影响	(238)
第九章	中日政治变革思潮的相互影响与复杂互动	(249)
一	中日早期知识—思想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249)
二	维新派师法日本明治维新,“腹地自立”的政治实践	(252)
三	知识变动、思潮变革与东亚文明体系的重构	(262)
结论		(269)
参考文献		(274)
后记		(279)